

我，要我组织科学方法论研究小组，每月一次到他国防科委办公室讨论，接受他的亲自指导。如此一直持续了多年，直到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1986年，他组织了系统学研讨班，我每次都参加集体研讨，聆听他的教导。他还让我在讨论班上专题介绍国际学术界系统论研究的进展，他鼓励我创作《系统论》一书，这个任务一直到1995年我与曾国屏教授共同完成。该书于1996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清华文科首部学术专著公

开发行，现已出版了三个版本。

从1979年我第一次到钱学森同志办公室参加讨论，一直到1996年，我们有30多封通信，还积累了每次与他讨论的几万字记录本。后来，这些珍贵资料我都捐献给了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钱老对我学术生涯的影响和17年的教诲，令我终生难忘。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之际，根据我与钱老的交往，我与庄茁教授共同主编出版了《钱学森与清华大学之情缘》作为对他的怀念。

文艺社团的经历奠定了我的人生轨迹

○陈鸿波（1979级工物）



1980年代清华文艺社团民乐队“三驾马车”，左起：胡杨、陈鸿波、牛景辉

我第一次走进清华大学，不是去系馆，也不是去宿舍，而是去了音乐室。当时音乐室就在一个大下坡的右边，后来是校团委所在地。那天下着小雨，我印象非常深。

我为什么先去了音乐室呢？因为我从小会打扬琴，拿到清华录取通知书后，就有一位朋友孙静介绍我去清华音乐室见陆以循、王震寰老师，说或许可以加入清华

的学生文艺社团。陆老师和王老师听我打了一段扬琴，说挺好的，就让我入学后来民乐队报到，我就这样加入了清华文艺社团民乐队。

入队后大概三四个月开始改选，经过无记名投票，我被选为队长，觉得非常荣幸。两位副队长是土木系的胡杨和水利系的牛景辉。随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相互支持，密切合作，被称为民乐队的“三驾马车”，成为关系非常好的朋友。

回想起来，我特别感谢父亲教我打扬琴。因为这个“一技之长”，使我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数清华学生的生活都是宿舍、食堂、教室三点一线，而在文艺社团就不一样了，不仅有了更丰富的生活和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未来的事业和生活也有了更多的机会。比如，如果不会打扬琴，我就不会认识当年的文艺社团团长、后来的清华科技园创始人梅萌董事长，今天也就很可能不会在清华科技园这样一个



2007年，陈鸿波（左）和当年文艺社团团长、时任启迪控股董事长梅萌（右）在清华科技园一起接待外宾

好的平台上工作，我的人生也很可能会非常不同，所以我对在文艺社团的这段经历感到非常幸运。

文艺社团给了我这个舞台，我就和队友们一起，整合校内外各方资源，努力提升民乐队的艺术水平。我们请中央广播乐团当时著名指挥家彭修文老师给我们做过指导；还邀请过著名琵琶演奏家刘德海、何树凤，二胡演奏家闵惠芬、周耀锟、张方鸣，中央民族乐团首席扬琴李忠等，这些人都是当时一流的艺术大师。在文艺社团，不仅能接触到这些大师，还能近距离接触到学校的各级领导，后来我出任校团委副书记，大部分原因应该也是在文艺社团这个平台上，更有机会让领导和同事们比较全面地了解自己吧。所以说，文艺社团的经历奠定了我的人生轨迹。

外出演出的经历也让我难忘。1982年文艺社团复建后首次走出校

园，去了天津大学；1983年去江苏徐州、南京、扬州、镇江等地；1985年乘火车去上海，然后坐船去厦门、泉州、莆田、福州。1986年我已到校团委工作，还带领文艺社团去过兰州为中学生演出。基本上每次出去演出前我们都要集训半个月，在密云、怀柔等地，大家每天集中住在一起，大大地增进了队友们之间的了解和友谊，非常难忘。记得有一次在怀柔水库边上，晚上月亮特别亮，民乐队在一个平台上摆好队形，平台下面就是水库，我们一起演奏《月儿高》，那是相当的有感觉。人一生能记住的场景毕竟有限，我大学生涯中能记住的场景多数都是在民乐队的排练、演出、郊游、集训。还有那些在北京的演出，如人民大会堂、民族宫、怀仁堂等，这些地方我的扬琴都在台上摆过。作为学生，念书是主要的，但阅历和经历也非常重要。拥有学生文艺社团这样的机会和平台，一方面是人生的享受，另一方面带给你更多的见识、更广泛的朋友圈等，都会在你未来的人生旅途中助你一臂之力。

当然，清华大学不可能让所有的学生都进入文艺社团，但学校尽自己的力量保证有这样一支团队的存在，从而培养出了



1983年赴江苏五市演出前，文艺社团民乐队在怀柔水库集训。扬琴左后方拉大提琴者为陈鸿波

很多综合型人才。体育代表队和文艺社团是清华大学培养拥有综合素质人才的重要平台之一，这两支队伍中有些成员的学习可能不是最好的，但我相信，他们在社会上的贡献和影响力，也绝对不会辜负学校的期望。

当年社团日常活动还是比较有规律的，每周四下午或者周五下午拿出整个半天，到音乐室去排练。每年有一次外出集训，假期有外出演出。在学校，有规范的迎新演出和新年演出，还要参加学校的活动，在主楼、二教等地点，我们还承担过外宾接待任务。排练、集训、演出构成了社团活动的主要内容。可以说，在清华大学五年的学习生涯中，我的业余生活绝大部分都是在文艺社团度过的。

我印象中军乐队的周乃森老师非常厉害，排练时他洪亮的口令可以压过整个军乐队。当时我们听说，军乐队录取队员的时候，他让同学张开嘴看看，牙不漏风就能入队，这可能只是一个传说。但很多零基础的队员经周乃森老师辅导一段时间就能上台演出，却是不争的事实。民乐队可不行，民乐队对队员技巧、水平要求都非

常高，没有一定水平是进不来的。当时我们队里有一位打扬琴的队友杨学梅，在报考中央音乐学院过程中据说是一直考到最后一轮的；还有一位拉二胡的队友刘进，入学前就是省级专业文艺团体的主力。可以说民乐队的演出水平应该算是文艺社团里面比较高的。1984年我们在学校大礼堂搞过一场《华音》专场音乐会，我至今还保留着整场音乐会的录音。

我当队长的时候，文艺社团还没有集中住宿，呼吁了很久时间，到1985年左右才终于实现了。一些同学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儿，你不让他来他会哭。当时的社团里面还有很多幕后积极分子，管理灯光、音响，蹬三轮车装卸乐器，拉幕、摆台等，总有几个热心人，这些同学是真的喜欢文艺社团，不用任何人给他们分配任务，所有的事情都能做得干净利索，完美无缺。

当年文艺社团有很多高水平的节目，如合唱队和管弦乐队合作的全本《黄河大合唱》，民乐队的民乐合奏《月儿高》《彩云追月》《荷塘月色》等。《荷塘月色》是王震寰老师自己写的，很有意境。

说起王震寰老师，他既是我们尊敬的师长，也更像我们亲切的家长。我们和王震寰老师关系非常好，周末会到他家去蹭饭，有什么不愿意和父母说的心事也都会和他吐露。出去野炊就到他家拿锅，用柴火煮饺子，然后把熏得黑黢黢的锅再送回去。王震寰老师戴着非常厚的眼镜，中间很薄，都变成小窟窿了。他视力不好，所以讲义上的字写得非常大，用碳素墨水钢



1983年，文艺社团民乐队在江苏演出间隙游览扬州瘦西湖。
左2为陈鸿波



清华民乐队在水木清华平台演出，打扬琴者为陈鸿波

笔一笔一笔地描成核桃大的字，A4纸一页就只能写十几个字。他讲“中国音乐史”，那是面向全校学生的选修课，一节课的讲义就非常厚。上台指挥他也看不清，拉开大幕以前要先扶他到指挥位置，别的指挥是拉开幕再上来，他要先到位再开幕，曲目演奏完了要先关大幕，再扶他下去。我1979年刚入学的时候，记得他还能骑自行车，但很快就不行了，只能走，或者我们队友用自行车接送他来音乐室排练或者去参加演出。王震寰老师对清华学生民乐队的复建和发展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觉得王震寰老师代表了清华教授的一种风骨。不求名，不图利，一门心思就是想着他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们。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精神，燃烧自己，实现自己的价值，让别人分享他的精神世界、他的音乐才华。过去了那么多年，他慈祥的面庞永远地印

在我们心里了。

可以说，社团每支队伍的指导老师就是这个队的灵魂，每次校庆队员们回校，首先想到的都是回来看老师。“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营盘就是音乐室，就是艺教中心。虽然很多老师已经故去，但看看他们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看看路边的那扇窗，老师的音容笑貌就又浮现在眼前。

能够考入清华大学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还能够进入艺术团并有一席之地，不仅很幸运，也为人生奠定了丰厚和扎实的基础。所以希望今天的同学们要珍惜在清华大学课外活动的经历和体验。清华是一个知名学府，学习是本分，但也要珍惜其他的机会。要把在文艺社团、体育代表队的工作、演出、排练当成对自己人生基础的打造。今天你在这里所做的一切会对你的人生产生预料不到的影响。社团里唱唱跳跳、排练演出只是一个过程，但你为了唱好这首歌、演好这支曲目所付出的努力，为了管理好一支队伍并让她表现出色，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种实实在在、真刀真枪的锻炼。我当年管理三四十人的民乐队，真的就像管理一个企业一样。那个时候每个队员的生日我都会记得，他们的父母春节会接到我的贺信、贺卡，一些大的



1980年王震寰老师指挥文艺社团民乐队在清华大礼堂演出，打扬琴者为陈鸿波

演出完了以后我会把照片、感谢信寄到他们家里去。这是因为我把民乐队的日常工作当作事业来做，我是用心在做每一件事。做好“人”的工作，比调好“弦”更重要。队长首先要把自己的心交给乐队，才能带出一支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的队伍，演奏的曲目才能感动听众，引起共鸣。

清华文艺社团营造出的文化像一个“场”，也像酒的酿造一样，在这个文化

环境中大家互相影响、相互熏陶，共同成长。文艺社团出来的人身上都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即对事业的追求，对工作的一丝不苟，对人充满热情，对生活无限热爱。

感谢清华大学，感谢清华文艺社团，给了我这样一个平台和机会。我后来出国十年，最后还是选择回到祖国，回到清华这个圈子里，既是为了报效祖国，也为母校发展尽了自己一份微薄之力。

90年代中文系读书时的人和事

○金兼斌（1986级工物）



金兼斌教授

2023年是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建院30周年。回头来看，30年前清华大学成立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标志着清华大学开始重建人文社会学科之路，实质性从一所工科大学向综合性大学转变，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但清华大学重建文科的探索和尝试，其实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

我是1986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高中时，我文理比较均衡，虽然以理科生参加高考，但对人文社科其实也很感兴趣。80年代的清华是一所不折不扣的工

科大学，不仅体现在学科设置上，也体现在校园风貌和校内各种规章制度和行事习惯背后的思维逻辑上。我并不很习惯这样的环境，加上周围学霸环伺，高中时借由各科平衡而确立的综合优势，来到清华后发现几乎每一科都有一堆好手排名在自己前面，专业的兴趣和认同感迟迟未能建立起来。每次进出工物馆，除了熟悉，却并无亲近感。毕业设计时，有一日熬夜在实验室分析数据，记得有那么一个瞬间，蓦然抬头，惨白的日光灯下，满眼是仪器设备对我冷冰冰地注视着。那一刻我生出一股绝望之情，坚定了今后要向人文社科方向进行转向的决心。

其实在大三时，我就听说当时以开设全校性人文选修课为主的清华大学中文系招收面向校内各理工学院系学生的科技编辑第二学士学位项目。我在正式申请这个项目前，已经选修或旁听了中文系不少老师的课程，包括徐葆耕老师的“西方文艺思潮”，丁夏老师的“中国古代小说”，杨